

# 毛泽东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李 珍

**[摘要]** 毛泽东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唯物史观是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理论内核,“古为今用”的史学目的论是它的突出特点,历史主义的史学方法论是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方法不断创新的学术背景下,探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历史地位,对于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毛泽东;史学思想;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3)11-0039-08

毛泽东史学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它主要包括历史科学研究的目的与任务、指导思想与方法,正确对待历史文化遗产,历史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等内容。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对这些理论命题所作的精辟阐发,深刻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路径及基本面貌,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从治史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方法的角度来看,其荦荦大者,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 一、唯物史观: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理论内核

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石。它要实现与历史悠久、遗产丰富的中国史学相结合,有两个必要的前提: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历史及其前途作科学分析。在这两个方面,毛泽东都作出了里程碑式的历史贡献。

青年毛泽东不断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经过多年如饥似渴的学习、比较,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自从20世纪20年代成为一名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史观就成了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他关于中国农民问题、中国社会各阶级问题的透辟分析,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所作的回答。《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则是他较早对世界重要历史事件所作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他鲜明地提出,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人类历史,“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sup>[1](p.34)</sup>他认为,陈胜、吴广的起义,刘邦的反秦,洪秀全的反清,都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的重要内容,就是用唯物史观分析、评价中国古代历史,纠正大家思想上普遍存在的英雄史观,推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了解,促进革命运动向前发展。这表明,科学的历史研究已经开始成为毛泽东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了。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代历史作相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是在延安时期。在这一时期,为适应变化了的革命形势对党的理论创新所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中国历史的客观总结,是这个理论飞跃的重要内容。这说明,中国

作者:李珍,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

马克思主义史学与中国革命运动之间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毛泽东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范畴,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等,都作了阐发,从而使唯物史观具有了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之下的理论形态。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唯物史观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首先,坚持唯物史观的指导是中国史学真正成为科学的理论前提。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人们对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错误的了解。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sup>[2](p.283-284)</sup>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历史学才可能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进而成为一门科学。毛泽东与郭沫若、范文澜、何干之等历史学家的交往,其主要内容都是勉励他们以唯物史观为观察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钥匙,“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sup>[3](p.814)</sup>写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专著。与对唯物史观的倡导相适应,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等文章中,对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作了辛辣的讥讽和批驳。他认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而西方资产阶级比如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sup>[4](p.1516)</sup>

其次,阶级分析法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首要研究方法。阶级斗争贯穿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用阶级观点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sup>[2](p.283)</sup>“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sup>[5](p.602)</sup>我们运用这一方法研究历史,就是

为了透过历史表象把握本质与规律,进而推动伟大的现实运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著作,是毛泽东运用阶级分析法,解剖近代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中国历史的经典之作。其中关于近代中国的阶级构成、历史脉络、关键节点,以及关于革命性质、对象、任务、主力、策略和前途的精到分析,已经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所证明,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研究。通过这些著作,唯物史观真正确立了在中国历史学尤其是近代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

再次,人民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动力作用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着力反映的内容。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早在1919年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看到了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巨大力量,把“社会的改革和反抗”的希望寄托于他们的觉醒与联合。后来,他又多次强调人民在创造世界历史中所起到的动力作用,反对“唯心论历史家”们的英雄史观。“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sup>[3](p.1031)</sup>“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sup>[6](p.115)</sup>当然,突出人民群众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否定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承认领袖人物的历史作用,但领袖人物的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支持。“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的作用的还是群众。”<sup>[7](p.402)</sup>“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sup>[8](p.358)</sup>歌颂人民、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突出的时代特征。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真正结合,是在从事这一工作的史学家们的自由争论、相互切磋中不断深入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除了对以

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的直接倡导,毛泽东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推动作用尤为重要的,其表现是他对学术自由讨论氛围的维护与支持。“百家争鸣”的思想,就是毛泽东1953年针对范文澜、郭沫若两位史学家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而提出来的,并将其作为新创立的《历史研究》的办刊原则。他还身体力行,带头贯彻这一方针。1956年,一位苏联学者表达了对《新民主主义论》关于孙中山的世界观论点的不同意见,我方陪同人员认为此举“有损我党负责同志威信”,请示是否有必要向苏方反映。毛泽东明确指出:“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sup>[19]609</sup>1958年7月,他婉言谢绝为周谷城所著逻辑学著作作序,其理由之一,即是“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sup>[5]6-540</sup>1965年7月,他一方面支持章士钊出版其《柳文指要》,一方面又客观地指出:“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同时,他还表达了对高二适与郭沫若商讨《兰亭序》真伪问题的支持意见,“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sup>[5]6-602</sup>类似之例,在毛泽东的批语、信件中还有很多。这种高度的学术自信与自觉,对唯物史观在历史学各个领域迅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到新中国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现实运动的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的重要方面。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古代史、思想史、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等领域都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sup>[9]6-37</sup>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十七年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导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研究、教学体

系,出现了一批史学大家和史学名著。这些成就,都是在唯物史观的正确指导下取得的,同时也与毛泽东思想及其著作的广泛影响,与毛泽东本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度重视直接相关。

然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这一方面表现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教条化理解运用唯物史观问题,历史学的科学性遭到严重破坏;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唯物史观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现在有了新的理解与认识。前者与毛泽东本人在晚年逐步偏离了正确的思想认识有关,也与历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存在教条化、片面化倾向有关。后者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正常情况。对唯物史观的某些具体观点,结合发展的客观实际与理论需求,作出更加符合中国历史的准确的、全面的解释,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具体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自然,这两种情况,都不能成为否定唯物史观、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性的理由。

作为正确阐释了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始终要坚持与守护的。离开了这些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这个角度说,历史科学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毛泽东在阐发、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 学习历史、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宝贵的经验。认真总结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服务于当前的历史学建设,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 二、古为今用: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突出特点

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当前的社会发展提供鉴戒与经验。正是有了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中国史学才两千多年绵延不绝,为世界文明史上所仅有。毛泽东将自古而有的这种鉴戒思想,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提出了“古为

今用”的史学目的论,使其有了鲜明的时代意义。

### (一)马克思主义者要高度重视史学研究

首先,科学地把握历史、掌握历史规律,是客观剖析现实、明了方向的必要前提。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且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交织的古老大国,这一点显得尤为迫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sup>[10](p.533)</sup>其次,历史是前后相续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科学总结历史,阐明历史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中华民族“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sup>[10](p.623)</sup>对于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我们应当给以总结,并加以科学的说明。他尖锐批评有的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sup>[13](p.758)</sup>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sup>[13](p.797)</sup>

### (二)研究史学的目的是服务于今天的现实运动

毛泽东明确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sup>[8](p.82)</sup>批判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sup>[10](p.707-708)</sup>史学工作应当给人们以启发,给人们以信心,不是引导人们向后看,而是引导人们向前看。“我们必须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sup>[11](p.191)</sup>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被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sup>[12]</sup>其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揭示历史真相,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反映、阐明历史发展规律,服务现实运动。因而,“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sup>[10](p.532-533)</sup>提高民族自信心,引导人们向前看,正是史学工作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的基本原则。

### (三)正确对待史学遗产的基本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对于这些成果要作辩证分析,“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sup>[11](p.191)</sup>但同时又“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sup>[10](p.708)</sup>对待封建文化应当有辩证的态度,它“也不全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sup>[13](p.225)</sup>总的原则就是“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sup>[10](p.707)</sup>而“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sup>[13](p.225)</sup>这一认识,反对了两方面的绝对化倾向,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史学命题,同时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对历史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家们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立场,深刻影响了各个领域学术研究的基本思路。

### (四)毛泽东是践行古为今用原则的典范

毛泽东是一位史学素养极为深厚的政治家。他本人的史学实践,就是践行古为今用原则的典范。他关于史学的社会作用与根本任务、如何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等问题的论述,着眼点都在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服务,使共产党人对实际运动有“深刻的了解”,为解放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提供帮助。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分析,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成为中国共产党确定革命战略、策略的重要依

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才以史学著作的形式,起到了反映中国历史实际、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大历史作用。另外,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毛泽东对《汉书》中的说法,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提炼和改造而提出来的。在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也是通过对党的历史、党的理论、党的组织的正本清源,达到了团结同志、统一思想的目的,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和研究中国现状、中国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桥梁的重要作用。

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还熟练运用历史上的事件、人物,通过对他们的评价以古喻今、阐明道理、指点迷津。比如,井冈山时期,用黄巢、李自成起义败于流寇主义的历史来说明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抗战时期,运用“围魏救赵”的战例来说明游击战争中的战略防御问题;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用周瑜这个“青年团员”带领东吴军队打胜仗的历史,提倡选拔干部要看能力,德才兼备,不能论资排辈;“大跃进”时期,用《登徒子好色赋》的反例,说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片面思维方式的错误,希望党的领导干部学习郭嘉,多谋善断;“七千人大会”期间,用霸王别姬的故事,教育干部要听得进不同意见,防止“批评不得”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用触谏说赵太后的故事,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要严格要求子女,防止他们“变质”;用孔子的课程,同样也“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sup>[14](p.2279)</sup>的史实,论证教育改革的必要性;等等。这些信手拈来又贴近实际的史实,与毛泽东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阐发水乳交融,起到了极大的说服教育、思想动员的作用。

在具体史学研究领域,毛泽东认为,历史研究同革命斗争相联系的原则,应当贯彻在史学工作各个方面。1939年1月,他在给何干之的信中谈到民族史研究:“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

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sup>[15](p.136)</sup>这里所说的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的抵抗与投降,与当时抗日战争中的抵抗与投降,自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具体内容,但从当时许多人对抗战没有信心、感到前途迷茫的背景来看,这种从“是非”的角度阐明抵抗与投降的对与错、利与弊,确有着突出的现实必要性;1939年2月,他主张对孔子的道德论“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是为了“与国民党的道德观有原则的区别”。<sup>[15](p.147)</sup>1940年9月,他致信范文澜,鼓励他运用唯物史观清算经学历史,也是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sup>[15](p.163)</sup>希望他能为此做有益的工作。1944年11月,他致信郭沫若,称赞他的《甲申三百年祭》被共产党人“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并希望郭沫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研究成果切中要害,“有大益于中国人民”,<sup>[15](p.241)</sup>有益于革命运动。周谷城说:“毛泽东‘古为今用’是没有人能企及的。”<sup>[15](p.162)</sup>其根本原因,正在于他将科学理论与实际运动、学术研究与革命事业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通过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为今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中国共产党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思想斗争中取得全面胜利,发挥了理论宣传、鼓舞斗志的历史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日益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发展壮大。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古为今用”也在一些情况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演变为历史研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以论代史”、“影射史学”。这是将古为今用作绝对化、片面化理解所导致的结果,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这个教训应当吸取。

总体而言,毛泽东所主张的古为今用的史学目的论,既不同于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经世致用”,更不同于资产阶级史家所说的“历史是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将“用”的基础，建立在经过真正科学研究的“古”上。这里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实事求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里所谓“颠倒了的历史”，指的是由于不同的阶级立场、不同的历史观所导致的历史评价的模糊、颠倒。二是把握规律，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引导人们向前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其社会意义之所在。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把握规律的基础。预设结论、剪裁历史、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都与真正的古为今用格格不入。既不回避历史学的阶级性，也不回避它的目的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理论上的彻底性所在。将科学研究的成果，通过各种方式服务于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础，也是其保持蓬勃生命力的内在要求。

### 三、史学方法论：毛泽东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学研究方法作科学的归纳、总结，是沟通哲学与史学、思想与实践的必要环节。毛泽东的史学方法论，同样体现出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即一方面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基本方法，一方面又在它的基础上，汲取了中国史学传统中的积极因素，对二者作有机的融合与创新。

####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

关于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有一段经典的论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sup>[13]（p.80）</sup>根据中国的实际，毛泽东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的辩证态度，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sup>[2]（p.187）</sup>“本

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sup>[2]（p.111）</sup>简而言之，尊重事实，科学运用理论，全面把握事实，正确分析事实，就是实事求是的研究过程。这一理论概括，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即历史“事实”是独立存在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之外的，是相互联系的。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史学家可以不断地接近并阐释它。从这个角度看，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是可能的。“实事求是”的概念，以中国式的语言，阐明了科学的史学研究应当具备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指导原则，从根本上纠正了封建史学与资产阶级史学或偏于一端，或主观随意的史学观念。

#### （二）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

毛泽东运用最多、最为看重的史学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运用这一方法，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基本任务，科学把握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反映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革命运动的科学认识，已经成为我们今天把握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理论基石。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也与阶级分析法的运用密不可分。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所运用的最重要方法就是阶级分析法。英雄史观、神意史观等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在中国历史学中的影响逐渐被清除出去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毛泽东的认识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我国史学界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重新认识，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重视，对曹操、秦始皇等历史人物评价的变化，都是在他的推动与带领下，运用这一方法还历史以本来面貌的努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这种转变本身及毛泽东所起到的积极影响，都是经得起检验的。

#### （三）全面的辩证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必然要求

毛泽东认为，由于“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所以“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sup>[4]（p.1157）</sup>“我们

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sup>[16](p.238)</sup>除了辩证地看问题,还应当用历史的、具体的态度去分析历史,即把“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搞清楚,“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sup>[16](p.400)</sup>形式主义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维方式,即“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sup>[3](p.832)</sup>与唯物主义的要求背道而驰。不离开历史的观点去研究历史,注意把辩证法应用于历史研究的过程中,表现在历史人物评价上,就是避免绝对化,坚持“两点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问题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sup>[17](p.137)</sup>不能“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sup>[3](p.994)</sup>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要结合具体背景,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古人。对于古代历史人物是如此,对于离现实更近、制约因素更多的当代人物,同样应有如此态度。在这方面,毛泽东对孙中山、陈独秀、王明等人的评价,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体现了他作为高明的史学家、卓越的政治家的见识与胸怀。

#### (四) 比较研究法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重要方面

在讲到如何研究党史问题时,毛泽东将比较研究法形象地表述为“古今中外”法。事实上,它反映了毛泽东对一般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因而也适用于其他领域史学研究。他说,“古今中外”法是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sup>[16](p.400)</sup>扩而言之,就是对所有历史研究对象作上下纵横的比较研究,“世界上没有这方面,也就没有那方面。所以有一个‘古今’,还有一个‘中外’”,“两种材料对照起来研究,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sup>[16](p.406)</sup>这种方法强调通过对历史研究客体相关因素的全面把握,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实。它启示我们要尽可能地开

阔眼界,以世界的、历史的视野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具体问题。

#### (五) 分析综合法是科学反映历史过程的重要途径

历史研究尤其是综合史的研究包罗万象,如何将纷繁复杂的史实主次分明、相对完整清晰地反映出来,是历史研究的难点,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毛泽东认为,分析综合的方法对科学研究非常重要。他借用苏轼的“八面受敌”法,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四面受敌”法。所谓“四面”,即指历史研究所有门类中最为重要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四个方面。在这四个方面的历史都分析好、研究好的前提下,才能“作综合的研究”,<sup>[3](p.802)</sup>进而“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sup>[16](p.381)</sup>这个过程,就是从个别到一般、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就是将个体与全体、分析与综合辩证统一的过程。毛泽东还将这一研究方法扩展到更为具体的史学研究领域,如认为最基层的家史、村史的研究,“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历史的基础”,<sup>[15](p.37)</sup>“县志、府志、省志、家谱”的研究,可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sup>[16](p.361)</sup>等等,都是他“分析而又综合”<sup>[16](p.380)</sup>思想的不同反映。

毛泽东在运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纵论古今,品评人物,收放自如,使中国史学理论中的积极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融合达到了新的高度,为“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所使用的具体研究方法也会有所不同。正是有了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科学研究成果,唯物史观才能够真正在中国史学研究中确立其指导地位。由这些方法论所带来的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认识上的转变,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独树一帜,以全新的形象有别于中国传统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

#### 四、结 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篇大文章。到今天为止,对这篇大文章的研究、探索仍在继续。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的结合,也是一个长期的过

程。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毛泽东史学思想无疑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从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长河来看待这个成果,它在推动史学科学化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就会更清楚。中国近代史学受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而开始转型,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真正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瞿秋白、郭沫若等革命者和史学家,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从哲学角度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深入浅出的阐发,并将其与中国史学相结合,进而塑造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毛泽东无疑是最成功的。其根本原由,是他能够站在历史的制高点,根据现实运动的需要研究理论,并由此出发对中国传统历史学做独到的解析。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新发展而言,这是应当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交流的扩大、视野的开阔,我们对唯物史观本身及其指导下的史学研究的把握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前景看,这些进展与毛泽东在其奠基与起步阶段所作的历史贡献,应当是一种补充、完善的关系。毛泽东史学思想的科学内涵,以及他坚持真理的理论勇气,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当继承与发展的。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多样化,还是在某些理论问题上不断有新的见解,都应当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角度去探讨。离开这个基本点去谈史学创新,很难取得真正的进步。如果所谓新的进展,直接或间接地恢复了英雄史观、神意史观,歌颂了剥削者、压迫者,甚至为侵略者涂脂抹粉,进而否定了“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性,那显然是与历史科学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的。

当然,对于毛泽东史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存在的失误,我们也不能回避。对这些失误做客观的研究与分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要面对的理论课题。从历史的眼光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难历程,都可以作为这个课题研究的宏大背景,同时也为寻找失误的原因提供了某种理论启示。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看,这些失误在本质上,是违背毛泽东史学思想基本原则的。区分方法本身与对方法的运用两个不同层面,对它们分别作客观、平实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应有的科学态度。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7]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9] 张剑平.中国共产党与历史科学的发展[J].史学理论研究,2011,(3).
-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2] 芦获.毛泽东读二十四史[N].光明日报,1993-12-20.
-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15] 张贻玖.毛泽东读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1.
- [16]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7]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美 景

developed lots of policies of great importance. He once wrote a holograph which read “We must fully regulate and harness Huai River,” and he appealed that “Affairs related to the Yellow River should be tended to,” thus drawing up the blueprint of the water conservancy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South - North Water Transfer Project.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the communists led by Mao Zedong has created new prospects with the Chinese people in regard to water conservancy and made monumental achievements for the water conservancy work.(HUANG Hong)

**Mao Zedong Historical Thought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Mao Zedong historical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arxist historical theory; it is also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Marx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its theoretical core;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historical teleology is its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 historicism is an organic part of it. Under the academic background—expanding continuously the field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innovating method, people explore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ao Zedong’s idea, which i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Marxism historical science in the new era. (LI Zhen)

**Maintain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Mao Zedong in the New Epoch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by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Party has acknowledged the great contributions made by Mao Zedong on difference occasions so as to maintain the historical status as a great leader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correct review of Mao Zedong’s historical merits is vital for the destiny of the nation and people. To adopt a scientific attitude towards the review of Mao Zedong is, in essence, the correct evaluation of the proper paths for China in the past, at the moment, and in the future. And that bears on the future and destiny of the nation and people. In the practice of broadening new horizons,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s of the past have been adhering to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has been the rightful preservation of the historical heritage of Mao Zedong.(QI Wei-ping)

**On Constructing the Way of Life with Cultural Soft Pow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To construct the way of life with cultural soft power is the dual demand of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acquire internal clustering force and external appeal. To achieve this call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ways of life, as well as the dialectical cohesion the traditional wisdom of life and achievement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We should acknowledge the pursuit of value system by individuals and their reasonable needs, thus achieving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social life, making a correct evaluation of rational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by the social groups, and maintaining a harmony of co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in regard to people and people, people and the society, and people and the nature.(SHI Xiang-jun YI Peng)

**Three Development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and Their Revelations:** Based upon the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three vital developments took place in the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in Shanghai in 2012. That is, the theory of ownership in Marxism, the surplus values theory, and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Marxism. As the trial area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the reform undertaken in Shanghai addresses the profound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ructure and system, and makes the attempt at structural innovations, setting an impressive example for the whole country. Not only will the summarization and introspection on these three developments serve to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in Shanghai, but also be of considerable meaning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WANG Tian-en)

**On the Self-Awarenes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one in which communists in china are persisting in the unification of 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knowing and doing, a key fact of which calls for the self-awareness,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In the new period, we must adhere to and develop Marxism,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push forwar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of the